

一曲“海之子”的吟诵

——读诗集《福歌与晚舸》

□曾镇南

在我以评论当代小说为主的批评生涯中，读诗评诗的尝试和经验很少。因此，当我面对何光辉的主题诗集《福歌与晚舸》时，是颇费一番踌躇的。特别是我开始阅读后发现，这是一部在旨趣和形式上都有些另类的主题诗集，我的惶惑就更甚了。

循着我暗中给自己定下的“读了再评”的写作规约，我开始研读诗集的第一篇章《海之歌》。虽然初读乍识，我一下子还不太习惯作者倏忽多变的构诗思路，也不太明了作者遣词用字的地域特色和方言语汇，但毕竟同是八闽大地之子，东海之滨乡人，我还是渐渐揣摩出了何光辉诗作里幽隐的意涵和比兴的参照物，感受到了他有些拗口涩拙的诗句里凝成胶状的诗情。因为是胶状，所以它不能流畅地涌出，只能缓慢地洇渗析出；但也因为是胶状，它有一定的浓度。诗缘情而发。何光辉的诗，不是少年未识情滋味的浅白空泛之作，而是中年造劫历世深谙世味之后的顿悟梦幻之语。它是值得认真读的诗者索隐探赜的。

幼小时听惯了姥太、姑婆讲述亲历的有关“海之子故事”长大；青年时怀揣“献身报国”之志才真正来到闽东南的大海边；成年后一直工作、生活在海峡两岸的“福地家园”，眺望海峡彼岸，浓积家国之思；还有与这一切组成的人生之路相伴而生发出来的文学写作，特别是诗歌写作之长途……这一切，都在光辉的主题诗集里有浓缩而曲折的反应。特别是在第一篇章《海之歌》里，就已经集中了在尔后的三个篇章——《家之亲》《物之语》《福之春》里所衍生出的母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何光辉的这部主题诗集，是有一个藏得很深的抒情主人公的，它既是一部抒写福建东南沿海连结两岸的“海之歌”，也是一部反复咏叹作为“海之子”的浩荡而婉曲的“自己之歌”。循此以进，便可以打通潜伏在海沟山石间的幽隐的解诗之门。

光辉的诗情，可以说是一个“福地家园”的“海之子”的乡恋情、念亲情、家园情、山海情、海峡情，乃至天下情；也可以说是个人的爱欲情、格物致知的物理情、入真出幻的感世情。在他的笔下飞出的每一曲“福歌”，闪现的每一艘“晚舸”，都是缘情而现的声与画。他的每一首诗，不论工拙精粗，都是一个独立的诗情体，因题而作，因事而异，都可把它当作独立的一首诗来读，来解，只要你有足够的阅读耐心。

还是来举几个诗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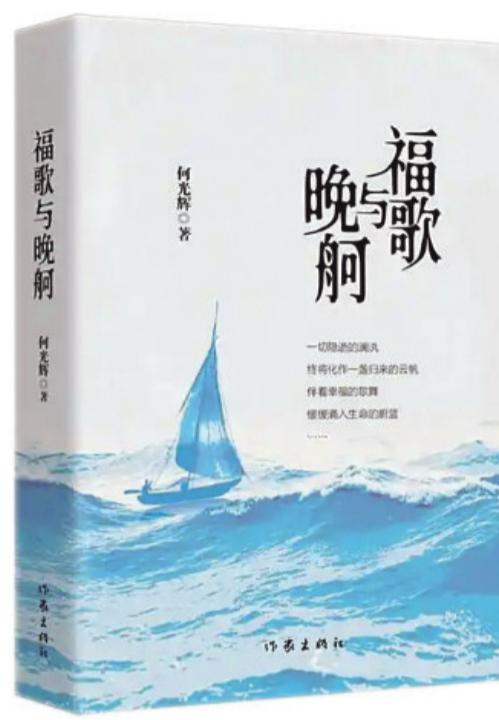
首章《海之歌》的第一篇《我是海平线的一支帆》，是提摄了整部主题诗集精魂的代表性诗篇。它先以第一人称表达了帆与大海母亲的渊源：它“出生就站立潮头”，是“行走在浪尖风口”上的风浪之子。“风若无恙，便是我生息的暖阳”。接着继续以帆的口吻，平实地自我观照，写出帆与海之间一落一涨、一低一昂相互默契的节奏感。把帆与海在激荡的冲动与平衡中的傲慢，“让山河血脉，昂过于晴空”的不息运动的目标感高高地抒写出来了。

后两节诗转换为第三人称的绘状。第三节写帆与最亲密的艄公的象征意味关系，高矗于晴空的帆俯瞰一位艄公的命运，挽起了艄公“一生的念想”，“以海为床，仰天为舞”，“何愁，没有新婚的花浆”。帆就这样注视着，沉思着艄公的命运，留下了喜或悲的悬念。第四节也即全诗的收束，仍用第三人人称凸显“与燕同窗，与水同聊”，牵系着“平潮线上的思念与悲怆”的海上一支帆的兀然高立的形象。这是诗人对风浪之子“帆”这一物象的沉思，也是对“帆”的艺术意象的抽思演绎。

“是水柔情，是山激扬/发自于能量与信仰之床啊。/就

像/霜雪里的老者，流觞曲水/看淡所有的过往。/哪怕只剩

一支帆的今生，/也要紧握/把头颅矗立于海天/还于前世的



万丈光芒”——这是对帆的礼赞，也是对海的拥抱，更是对人即感物而发诗兴的抒情主人公无意中的自我塑绘。诗人借助人称的悄然变换，完成了对咏帆诗的多重意象的营构。善于构思复合型的一本万殊的诗的意象，正是诗人的一个特征。

接下来的十几首诗，诗人把自己的家世，变幻地构思为一幅幅海岬渔家的写实画面，把由离家的游子，养育外孙的“查姥”，守着宗祠老家的阿妈构成的海岬之家的三代人支柱，在诗里呈现为一个旋转的立柱、多姿的中轴。有的是属于历史的黯淡悲剧，如《红砖厝的唢呐》《姑婆的一片海》《等海的阿辉》等，而那首先把台海聚合与分离的历史地理之歌扩展吟唱出来的《垒石台的情歌》，则是抒写台海家国情怀，民族血胤的悲壮、宏朗的高吟豪唱，是提升这部主题诗集的意愿和境界之作。

融入了诗人亲身经历和现实生活观察而成的抒情诗中，也有寄托私人情愫和微妙感触的《归港的谎言》，此诗表达了幽隐曲折和翰藻的深邃与闪烁。而《扫滩人》勾勒出的被岁月和海湾拉弓了腰的扫滩劳动者的形象，既有岁月的沧桑感，也有在桥头迎风梳妆的“老人与狗”画面的仪式感。还有写得那么清澈明丽的爱情与劳动之歌《撒网的阿郎》，是“渔村好年景”中一帧美丽而缠绵的特写镜头，“暖暖的脚步，/与一次次的心跳/惊飞一朵晚霞/撞进广阔的旷野，/激情荡漾”，堪称鲜亮的“诗眼”；末节“噢！无意间的一笑/我游弋在为你布下的天罗地网/我是鱼，你是渔/同命同祖，同饮一池琼瑶”。甘被爱情俘获入网的少年的率真和幽默，使这首爱情小调平添了几分俏皮的味道，落笔在撒网的阿郎身上，却隐约可见一个娇俏的渔女形影呼之欲出，达到了目注此而神在其的艺术效果。

最见地域历史特色的，可谓咏妈祖的《海的眼光》与写在崇武西沙湾为保卫海边一对老百姓母女而牺牲的27位解放军战士而兴建的“兵庙”的《兵庙里的恩情》了。诗人笔下的黑脸（般）妈祖形象，既有人世间女儿的温存与博爱，也有

“龙宫里推落的一粒过河的棋子”的神秘“海的眼光”，也即天眼之光。最后一句用妈祖的口吻，说出海的女儿的神性来自她所庇护的芸芸众生，鲜明地揭示出妈祖神祇的民间性。

《兵庙里的恩情》是一首依托于实有本事的纪实诗。何光辉的诗笔，把这件“诗本事”，写得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与神采。以不忘报恩的闽女吐露的心声是多么沉痛而激越：“有一种使命叫重塑/悲痛后拂起这把灵魂的红土/泪渗成浆，血染成色/你把无名影子捏成冲锋的样子”；以朴实无畏的青春名义，供奉于兵庙的誓言和宿愿是多么崇高而伟烈：“我的命，肉身之躯/生命的四重恩，活生生的/来不及问过你们的姓名/青春，却用廿七个心跳/丈量一个世纪最厚重的意义/今生，我要升一处高堂，日出东海/报答你们的鱼水深情”。这首本事诗，就这样升起了这部主题诗集的一个精神高地。它坚实凝重且有清扬飞动之势的艺术笔调，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这部我初读时感觉有点扑朔迷离，难于索解的诗集，在反复寻绎之后，才找到了一个曲径通幽的洞口，看到了一个稍稍清晰豁朗的诗的天地：这是诗人基于自己的家族、身世、经历、感受、思索而写出的自传诗，也是一曲绵长厚密的海峡此岸的“海之子”寄托山海之情、天下之志的史诗。在那些写得比较浑融畅达的篇什中，抒情主人公的家国情思，让我辨识出了某种楚骚、胡笳十八拍的况味；它使我想起了刘勰衡文论诗的两句话：“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用刘勰的尺度来衡量何光辉的诗歌，我当然意识到他这集子里的诗作思想艺术水平是参差不齐的。笔力时强时弱，营构或精或粗，风调或文或野，成色有足有歉，诗集整体呈前紧后松之势，有同义反复之感，这样就不能紧紧拉住读者穷尽全境，卒读全篇了。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但我之所以仍用刘勰的尺度绳之，这是因为，衡文应有高标准。求之弥高，则促其趋于高格之力也愈强旺；期之弥殷，则提升其远大之志之内生力也越强劲持久。这也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之义的别一解吧。

在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实践和评论中，谈论主题创作渐渐多起来了。大多指的是单篇作品或成于众手的作品集共受一个鲜明的时代主题制约这种情况；像何光辉这种成于一人之手的上百篇作品汇为一集又赋予一个稍觉晦涩的主题笼罩全集的情况，似乎较少遇见。我刚接触时，不免有点少见多怪。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外艺术史上，是古已有之的。中国书画作品集，可以举《九章》《九歌》为例；短篇文言小说中，可以举《聊斋志异》为例。外国的呢，因浩如烟海，我所知孤陋，不敢轻率置喙，只举一个我因读鲁迅而想起来的画家为例吧。那就是生活和创作于100多年前的英国版画家比亚兹莱和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关于前者，鲁迅称他是19世纪末情调的“唯一的代表者”，“把他世上一切不一致的事物聚在一堆，以他自己的模型来使它们织成一致”。关于后者，以主题版画闻名于世。据鲁迅译介的材料称，他一生刻制了上万幅木刻作品，常常是有情节的系列画，如《我的忏悔》等。

看来，主题作品集的有意识的创作，在文艺史上是已有成为经典的前例的。也许何光辉在写作，汇集他的诗集时，正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但是，诗人一旦选择了创作之途，就不能以“我未尝想成为诗人”的谦辞，来回避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神圣的使命感和艺术创造、创新的自觉性、历史主动性。我诚挚地希望，诗人于主题诗集的创作，能从朦胧转为清醒，从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成为与经典遥遥相呼应的后来者。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这不正是一切热爱文艺，矢志艺的艺徒、作者应取的态度吗？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

《月亮山下》：泥土中长出的诗行

□赵炳庭

董顺学将6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月亮山下》题赠于我，这份承载黄土高原四十载岁月积淀的文学厚礼，既是一份知交的信任，更构成沉甸甸的精神契约。这部历经30年生活沉淀、3年潜心创作的乡土叙事作品，以厚重的历史质感与真挚的情感书写，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审美样本，是一部反映山乡巨变、讴歌劳动人民奋斗精神的优秀作品。

我与董顺学结缘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他的文笔敏锐犀利，擅长为普通人画像，字里行间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深切凝视。这种创作取向的形成，与其特殊的人生轨迹密不可分。

作为与西海固大地血脉相连的书写者，董顺学的创作根植于40余年的基层经历——从生产队会计到国营企业厂长，“在场者”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让他的叙事既饱含深情，又兼具批判性反思。他对西海固的书写绝非简单的风情展示，而是通过“贫困史”与“奋斗史”的双线交织，完成对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寓言式表达。对他而言，这部作品正如他所说，“我想写一部能反映家乡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巨大变化的小说”。其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生活广度与心灵深度的双重拓展。生活广度上，《月亮山下》继承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全景式再现改革开放前后50余年西海固社会发展变迁的真实历史，尤其聚焦1975年至1985年这一承前启后的十年。作者紧紧抓住历史关键节点，将宏阔的社会变革与村民个体命运紧密联结，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历史变迁。在心灵深度上，小说以主人公周思甬与齐梦莺、杨春燕、许桃花的婚姻爱情为主线，讲述这位生于海滨城市的青年扎根黄土高原的成长故事。因厉

史原因，周思甬被下放到王堡大队榆树湾生产队参加劳动改造。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完成自我锤炼与认同重塑，逐渐明白“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不能气馁”，内心愈发坚强，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意志力。

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藏着无数令人心酸的生存记忆：何凤治家年终决算只分得二斤豌豆；曹庆儿为养家糊口贩卖布票棉花票，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社员自留地被没收、家庭副业被取缔。为走出生存困境，周思甬带领群众搞副业：赴陕西宝鸡当麦客、修水库、挖煤，他总主动承担最艰苦的工作，将体力劳动视为对生命的洗礼。他的善良同样动人：曹庆儿不识字、不会算账常被骗，他便手把手教；何凤治寅吃卯粮，他便省吃俭用接济。

周思甬也曾陷入迷茫：两次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均被剥夺，但他从未颓废，始终坚守对理想与事业的追求。第三次终如愿进入省农学院，因成绩突出获留校机会，却义无反顾回到萧西县。从乡村农技员到国家干部，最后辞职返乡推动移民搬迁、筹资办学、绿化荒山，周思甬将所学知识与乡土生存智慧转化为脱贫动力。他从自卑到自信、从妥协到务实的成长史，既封存着个体命运的记忆，也沉淀着民族精神成长的钙质。

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小说以“典型性格”刻画让人物成为立体“复活”的大写之人。作者倾注心血塑造了周思甬、齐梦莺两位知青形象，还刻画了杨春燕、许桃花等血肉丰满的女性角色，即便配角也精雕细琢，尽显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齐梦莺与周思甬“门当户对”，作为周思甬的初恋，她年轻美貌、智慧勇敢，对未来充满憧憬。她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不幸，更是特定时代知青群体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杨春燕是敢爱敢恨的农村知识女性，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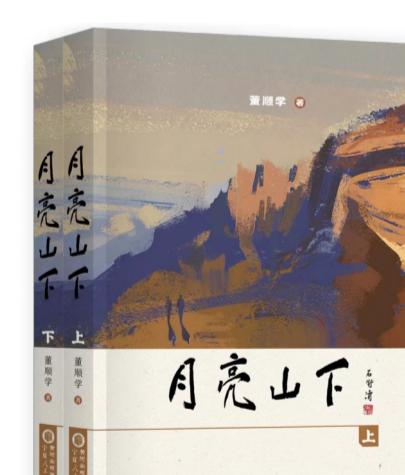
爱情的执着与对世俗婚姻观念的反叛极具魅力，最终依然痛失所爱。她的爱情折射出传统伦理与现代意识的激烈碰撞。许桃花是传统农村贤妻良母的典范，虽不识字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与周思甬的结合，既有“父母之命”，也暗含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策略。婚后贫穷与饥饿如影随形，她却从未被压垮。她的性格复杂多元，身份卑微，却内心坚韧，始终保持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对苦难的超越。

小说中的配角同样鲜活：曹庆儿单纯善良，何凤治憨厚朴实，麻石匠心地善良，杨鹤客老成持重，白秀才儒雅聪慧，文德利巧言令色，雷震天徇私枉法，吴有德阴险狡诈，贾阴阳装神弄鬼。这些角色共同构成乡土社会的“众生相”，作者以“白描点睛”之法，让次要角色也成为历史中的典型形象。

民族文化内涵的深度书写。《月亮山下》的“故事主场”设在西海固，作者不仅生动描绘当地的生存环境、自然景观与社会风貌，更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将地域文化与小说情节深度融合。

作者运用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熟语、方言、俗语、顺口溜，构建起独特的“西海固话场”。谚语如“人哄地一天，地哄人一年”；歇后语如“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方言如“曹庆儿一蹦子回家了”。这些语言充满烟火气与地域特色，既含幽默趣味，又具艺术张力，成为小说的独特标识。

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小说以“典型性格”刻画让人物成为立体“复活”的大写之人。作者倾注心血塑造了周思甬、齐梦莺两位知青形象，还刻画了杨春燕、许桃花等血肉丰满的女性角色，即便配角也精雕细琢，尽显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月亮山下》，董顺学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

生存技能，也暗含对农耕文化的剖析与反思。长期生活工作在西海固的经历，让作者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当地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早已融入他的血液，既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也塑造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

总体来说，《月亮山下》以社会变迁与民俗风情为基调，凭借鲜明地域特色的语言、真实生动的环境描写、细腻丰富的心理刻画、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入木三分的人性剖析，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乡土历史文化长卷。这部“生命之作”以厚重的历史质感、深邃的人性洞察与自觉的美学追求，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乡土叙事，应是“泥土中长出的诗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唐慧琴近几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北方乡村社会，以生活流的叙事方式讲述正在发生的乡村故事，摹写普通老百姓在新的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中复杂的伦理情感状态，呈现文明转型中乡村生活和乡村主人公们裂变中的成长。她的创作一方面体现了对于中国乡土文学地气根脉的承继，另一方面叙写当下乡村生活经验，表达了乡村社会群体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困惑与思考，以及能够让他们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新理想追求。唐慧琴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探索了新乡土文学写作的新路径。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乡村的确发生了巨变，出现了新的经济形态和伦理情感关系。与此同时，乡村中恒常的生活场景依然是乡土文学的地气与根脉所在。土地上人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为了生计的劳作与付出，这些依然是当下乡村生存的本质真实。唐慧琴的小说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记录了当下的乡村经验，以生活流的叙事讲述及物的、鲜活的村人与村事，捕捉到了乡村人物精神可贵的新变化。

《城墙上》以农村土地政策为题材，小说非常形象地讲述了涨租金过程中，村长、德高望重者、租地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纠葛，租户迪巧夫妇陪着小心的人情往来，一再被提租的愤怒，怒不敢言的压抑，以及面对复杂土地租赁现状的无语。在日渐扩大的矛盾中，这个文本中所有的人物都生活在一种不满的状态中，怨憎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注脚。然而作者并没有继续写矛盾和冲突，结尾荡开一笔，写了人性中的善依然是个体生存的某种底线。

《娟娘奔月》讲述了一个老实农民爱别离的故事。农民小石头得了绝症之后，贫贱夫妻相濡以沫的恩义，两位好友的念旧与照顾令人印象深刻。而小石头的选择则是中国农民式的选择，他有着凄惶无奈的悲伤，又有着接受命运的安然。文本深层的意蕴是人性善能够达到的救赎。主人公对于金钱和诚信的态度，对于良心清白的执着，这些既是个体的道德和价值选择，同时也是对于贪欲过盛的人性的救赎。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讲述了德顺颇为“拧巴”的性情。乡村生活包罗万象，德顺拧巴的行为处事与村民们格格不入。他渴望拥有一个身心契合的灵魂伴侣。同时，在养子宝成与德顺和解的过程中，又体现出乡村传统人伦秩序的规约性，以及宗族血脉亲情的温暖。在观念陈旧保守的乡村中，德顺是个异类，然而他却以自己不一样的富有理想追求的方式照亮了身边的人。

唐慧琴的小说鲜活地呈现了当下北方乡村生活图景。作品叙写着乡村社会精神情感的新旧更迭，混杂着现代性的浮躁喧嚣和功利欲望的蠢蠢欲动，同时也呈现出源于传统人伦，生成于现实之上的精神理想。《一弯新月》中的小惠是从乡村中走出的女性，在城里打拼多年。小说通过小惠的视角，讲述了新时代农村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中存在的困惑。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更多地从现代文明的层面关注观念的因袭与裂变，现代的物质生活并不能催生出现代文明，乡土社会的等级观念和陋习依然存在，这些还在侵蚀着乡村和农民。

《去高蓬》是对乡村生活中新伦理关系的探讨。随着乡村社会精神、情感和伦理生活的多元，乡村价值观念的稳定性被打破，乡村生活日益呈现碎片化趋势。认知的裂变带来新的生活观念，然而也带来迷茫和困惑，城乡嬗变中的乡村社会和乡村主人公们陷入价值伦理的困境中。

女性情谊是唐慧琴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女性朋友之间相知相交，互相体谅，互相成就，这类女性情谊带着乡土田园的纯粹和明朗。凌花、绵绵和蓉蓉是感情特别好的异性姐妹，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历经波折，然而最终还是保持了彼此的理解与情谊。豌豆两次为了小惠在众人面前挺身而出，她对于小惠的信任是无条件的，这种基于童年和女性情谊的感情是非常珍贵的。小争尽管对米花的所作所为时有不满，然而对于米花的勤劳、能干以及对于乡土的坚守却惺惺相惜。

唐慧琴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往往可以抽身于城乡的二元对立，以旁观者的清醒和理性来看待身边的乡村和县城生活。同时在不断变化的乡村生活场景中，女性情谊是文本非常重要的底色。这类新乡土写作中女性形象的塑造由此也显示出了别样的价值和意义。

唐慧琴的小说叙事还体现出一种坦诚的属于乡村百姓的利害观和价值观。作者通过对于乡土谨小慎微的刻画，呈现出了新乡土写作对于乡村人物叙事的真实性和当下性的探求。《长在屋子里的树》通过小福两口子和领导的交往，揭示了朴实老百姓对于领导既敬又怕、还带点崇拜的心态，即使领导被传言祛魅，内心纯朴的小福依然难以接受。《好大一棵树》表达了面对物质诱惑和功利性选择，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底线。

总之，唐慧琴笔下的乡村主人公们情绪状态真实饱满，情感质地朴讷诚挚，文化伦理观念新旧杂糅。作者笔下的文本世界在村人语境中讲述新的乡村生活经验，在道德和情感的纠结中展现乡村伦理价值的嬗变，在城乡转型的冲突中体现现代性的多样后果，又呈现出新农村新的精神形态和理想。她的小说有一个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根植在乡村物质生存和伦理文化语境中，同时又游走于县域生活场景。在离乡与还乡的语境中，小说